

刻写在铁轨上的中国精神

——评我本疯狂《铁骨铮铮》

□刘双喜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现实题材网络小说的大力扶持与精品化创作倾向的大力提倡,以题材细分见长的网络类型小说有了“用武之地”,大批作家积极开拓文学表现场域,提高作品精神品格,探索读者接受形式,展现了网络文学有为的一面。我本疯狂的《铁骨铮铮》聚焦少见的高铁建设,深入一线技工的工作现场,用创作实绩彰显了文学的时代担当。

《铁骨铮铮》的最大特色,是在当代中国故事的主流叙事中坚守人民立场,探寻铁路建设者的生活经验与精神血脉,实现了为时代明德和为工匠立心的有机结合。小说以民族复兴征程中的大西北高铁建设为背景,讲述了刘建为了完成师傅王忠国的遗愿,经历各种挫折坎坷,最终将宁西高铁银吴段工程建设成中国高铁标杆的故事,发展与建设从来不只是冰冷的数据和绵延的物理实体,更有生动具体的生存状态、情感逻辑和精神力量。作品写铁路建设过程时没有局限于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和开天辟地的万丈豪情,而是将人物置于各自的立场,个体的选择左右着其命运,也左右着小说的故事走向。在铁路建设的表层叙述之下,潜藏的是建设者与社会同频共振的个体真实,以及时代发展中人们习焉不察的现实程度。

在17万字的篇幅中,作者最大程度地将铁路铺设、基层党建、婚恋情感、脱贫攻坚等现实信息置于读者面前,让人近距离感受到时代发展潮流中的点点滴滴。在既往行业文“专业叙述”的基础上,《铁骨铮铮》将视角下沉,以更加接地气与细节化的方式深入生活,捕捉隐藏在宏大事件中的微小个体。如在马强夜半偷食物、村民闹拆迁赔款这两个情节中,农家少年因学业压力大而离家出走,黄土村大量盐碱地导致脱贫路漫漫,名牌大学高才生毕业后支援西部大开发……此类情节不仅凸显出男主角刘建细心善良、办事能力强的人格魅力,更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见证了西北地区广大乡村的某种历史的、现实的生存景观。大而化之的宏观观照不免空洞,具体鲜活

的第一现场才是文学表达的要义。就此而言,我本疯狂的写作昭示了网络文学记录和表现生活的新的可能。

作品的人物塑造同样亮眼。正如小说篇名,《铁骨铮铮》为我们呈现了以王忠国、刘建、吴振涛为代表的工匠硬汉形象,他们不是凡人英雄,而是英雄的凡人,其光辉伟岸的形象在同一群尸位素餐、蝇营狗苟的反面人物的对比中得以彰显。蒋子龙曾言:“即便是工业题材,最迷人的地方也不是工业本身,而是人的故事——生命之谜构成了小说的魅力。”作为有血有肉的非标签化人物,王忠国和刘建师徒和小说中其他人一样,也面临人生的抉择与情感的挣扎,以及工作的艰辛。面对交错复杂的领导、利益关系,师徒刚正不阿、兢兢业业,凭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拼搏精神把各种不可能变成可能,把图纸变为现实。王忠国的遗愿是道技合一的大国工匠理念的绝佳注脚:“宁西高铁是造福一方的项目,我理应为家乡出力,必须尽我所能将宁西高铁银吴标段建成中国高铁的标杆——这是我想留下的作品,也是我人生最后的愿望!”不难发现,铁路人的优秀品格与奋斗精神在王、刘、吴三人中实现了代际传承。作为老一辈工匠的典型代表,王忠国身患癌症依然坚守岗位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青年骨干刘建继承师傅的顽强品格和过硬技术,如愿将宁西高铁银吴标段建成中国高铁的标杆;实习大学生吴振涛努力正直,他的行事作风明显有其师傅刘建的影子。这种满带尘土朝露的质朴匠心一方面生动呈现了人物的独特生命经验,丰满了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令文本呈现出内在精神向度的追求。

从自身的工作经历出发,借助网络文学的创作和表现手法,深耕个体的实际经验,并将其熔铸于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铁骨铮铮》取得成功的秘诀正在于此。作者我本疯狂曾在一线铁路系统工作八年多,亲自参与了银西高铁的建设。现实中的故事和人物经过他的艺术提炼,贴合小说



《铁骨铮铮》的最大特色,是在当代中国故事的主流叙事中坚守人民立场,探寻铁路建设者的生活经验与精神血脉,实现了为时代明德和为工匠立心的有机结合。

铁骨铮铮

TIE GU ZHENG ZHENG

我本疯狂/著

用生命建设 致敬时代工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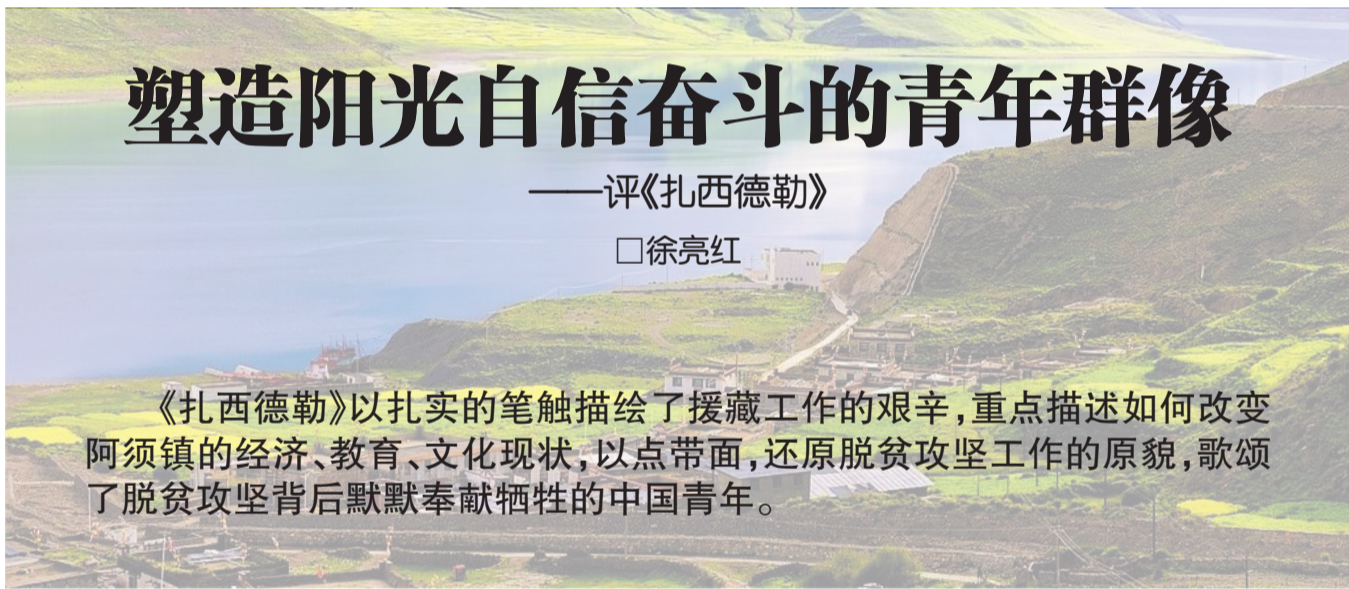
的写作逻辑,信手拈来的行业知识则保证了小说工业叙事的专业性。尽管如此,小说并非只是作者个人经历的“文学再版”。如果说立足现实,扎根现场赋予了作品较高的人民性和思想性,那么波澜起伏的情节、恰当的爽点设置则令小说满足了大众读者的兴趣口味。

相较于情节拖沓、灌水闲话的网络超长篇作品,《铁骨铮铮》显得“短小精悍”,这恰是它的优点所在。首先,小说在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网络小说重故事、轻人物的畸形模式。作者重在故事发展中表现人物,一次矛盾的出现和解决,就是一次主角人格的深化。相较于主角们的“脸谱化”形象,反方阵营的人物塑造更显现现实的复杂化与多异性:他们或老谋深算、或非作歹、或官商勾

结,性格不一,特色鲜明。故事情节在双方人物的观念、利益、情感的重重矛盾和不断交锋中展开。另外,作品爽点的设置同样引人深思。作为广大读者“明知故看”且令其欲罢不能的网文要素,爽是应有之义,但凭何而爽,如何爽得恰到好处往往体现出作家的艺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小说前半部分基本按照现实逻辑推进,就在反派赵金龙集团刚给予刘建“致命一击”,刘建亲自完成师傅遗愿无望时,故事迎来了最大的爽点——省委书记徐宁有如天降,突击检查施工现场并召开会议,刘建“工程质量重于政治任务”的理念大获赞赏,赵金龙一行人也因“婚礼风波”暴露了腐败罪恶行径,受到了应有惩罚。此处的金手指既是臆想的,又是合理的;既是虚构的,又是现实的。刘建的恪守岗位、坚持正义赋予了金手指深刻的艺术

真实:刘建这一形象由千千万万大国工匠的身影凝就而成,他的成功是工匠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和焕新。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客观世界的建设离不开主观精神的形塑,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更需要文学来书写。作为当代文学最具活力的类型,网络文学以其大众性、及时性、在地性成为讲述当代中国故事、建构当代审美主体的重要力量。在此,《铁骨铮铮》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创作路径:秉承乡土中国的精神资源,呼唤崛起时代的使命担当。创作手法上不失网络小说的畅想翅膀,精神向上保有传统文学的厚重感。此外,小说文本功夫扎实、语言朴实精到、情感真挚饱满,倾注了作者对中国铁路事业的一腔热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网络文学佳作。



塑造阳光自信奋斗的青年群像

——评《扎西德勒》

□徐亮红

《扎西德勒》以扎实的笔触描绘了援藏工作的艰辛,重点描述如何改变阿须镇的经济、教育、文化现状,以点带面,还原脱贫攻坚工作的原貌,歌颂了脱贫攻坚背后默默奉献牺牲的中国青年。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青年形象的建构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李大钊的《青春》等,都塑造了被社会迫切需要的现代青年形象。

在20世纪50—70年代,青年是“社会主义新人”,他们有建设新中国的价值感和自豪感。进入新时期以后,青年形象逐渐丰富,但受到西方“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等文化影响,一度出现过度强调自我感受、关注个人欲望的书写。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青年形象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一方面,青年人投射时代的“欲望”,他们渴望逆袭和成名;另一方面,青年人逐渐成为文化潮流的引领者和塑造者,他们渴望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中展现青春的风采。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年轻人的社交、价值观和文化传递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管是主流文化还是亚文化,只要具有正能量、能引起年轻人共鸣,都是传播面广、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文化。其中,家国情怀是较为重要的一种文化形态。

近几年,涌现了很多以年轻人为主角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如《山海情》《觉醒年代》《长津湖》《中国医生》《开端》《创业时代》《你好,李焕英》《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从中可以看出当下青年的情感结构和文化气质。当下青年面临中华民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国家情怀触碰现实生活,个人理想和主流文化交融,他们怀着热情奏响青春奋斗的最强音,涌现出了很多年轻人的楷模,如基层村官黄文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护人员、青年志愿者、快递小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带头人等。

新时代青年作为“奋斗者”形象跃进大众的视线。获得七猫中文网第一届现实题材征文大赛最高奖项“金七猫奖”的《扎西德勒》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作为一部表现“援藏”题材的网络小说,作家胡说出立足真人真事,描写了一批放弃大城市优渥生活的年轻人,在县长毛华盛的带领下,奔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援藏的故事。除了毛华盛三十多岁,已经成家生子之外,这批年轻人平均年龄二十多岁,大学毕业工作没两年,他们带着热情和勇气,来到贫穷的德格县,在医疗、教育、行政等岗位上工作。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们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帮助当地百姓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不仅完成了修建乡村公路、铺设4G网络、进行新农合报销、种植藏药材、动员老百姓拆迁、开展牦牛养殖、重建阿须镇小学和镇医院等工作,还在德格县大力发展旅游业,让德格县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促使德格县的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并完成脱贫攻坚的工作。

《扎西德勒》以扎实的笔触描绘了援藏工作的艰辛,重点描述如何改变阿须镇的经济、教育、文化现状,以点带面,还原脱贫攻坚工作的原貌,歌颂了脱贫攻坚背后默默奉献牺牲的中国青年。这批中国青年形象刷新了读者对网络文学满屏玄幻、娱乐至死的固有认知,他们宣告了另一种可能:投身基层,帮助他人建

设美好的家园、实现人生价值,还有比这更炫酷的生活方式吗?

在塑造青年形象时,《扎西德勒》没有正面描写脱贫攻坚这一重大题材,而是将援藏的主题与青年的私人情感紧密联系,让作品具有接地气的灵气。首先,援藏带头人毛华盛是二次援藏,他想把未完成的工作继续做完。当时,毛华盛的妻子李秀秀怀了二胎,她对丈夫顾不了家心有怨言,毛华盛对妻儿也怀有内疚之心。其他的援藏成员也各有私人心愿,医生李鑫援藏是想完成父亲遗愿,杨韵是想摆脱和前男友的失败恋情,饶博文是想援藏后回到成都能够升职,而付雪珍是出于好奇而援藏。在援藏过程中,饶博文时常见工作激进、缺乏耐心的毛病;付雪珍因为受不了德格县恶劣的气候和繁重的工作,闹着要回成都;杨韵因为身体不太好,常觉得工作力不从心;李鑫的母亲反对儿子援藏,与儿子屡次发生冲突……可见,这些援藏青年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和烦恼。人物身上的不足之处让他们的形象更具真实性和可信度,也凸显了援藏工作的艰难,以及援藏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扎西德勒》将感情线穿插在重大题材中,也是一种创新。毛华盛和李秀秀经常秀恩爱;付雪珍和男朋友顾明一起援藏,为的是能朝夕相处,而不用忍受异地之苦;杨韵和李鑫相恋是因为两人志同道合;饶博文后来放弃回成都,继续援藏,除了爱上这片土地外,也是因为感动于央宗卓玛的深情。这些青年把事业和恋爱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战胜了困难、磨砺了心性、升华了精神,而且找到了援藏的意义,获得了巨大的成长,完成了“大家”与“小家”、“大我”与“小我”的完美结合。

作为一部网络小说,《扎西德勒》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爽”点不鲜明,也缺乏金手指,这很特别。作者不讲噱头,踏踏实实讲故事,表现当下青年在时代中的际遇和价值,丰富了当代青年的群体形象。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背景下,《扎西德勒》中的青年群体不逃避现实、不游戏人生,以饱满的精神面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服务于基层的奉献精神,以及超越自我的勇气来重塑新的生存样貌,为当下青年提供了另一种价值想象范本。可以说,《扎西德勒》中的青年群体有血有肉,他们对爱人大胆告白、对困难毫不退缩、对反面势力决不妥协、对陈风陋习破旧立新,符合当下青年敢爱敢恨、不苟同于世俗的精神气质。

如同莱蒙托夫所称,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当代英雄”,《扎西德勒》里的青年便是我们时代的“当代英雄”。他们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并不一定过得顺遂、辉煌、受人瞩目,但展现出的阳光、自信和勇气,却是其他时代的青年较少具备的。近年来,网络小说聚焦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全面小康、科技攻关等题材,诞生了众多奋斗的青年形象,重塑了网络小说的精神内核,提升了网络小说的价值纬度。无疑,《扎西德勒》作为其中的代表作品,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当一个人开始撤退,有关他的事情,正在显露出来。

在蒋离子的新书《糖婚:人间慢步》(重庆出版社)里,随着新灿集团总裁于新自杀,原有的秩序和平衡也同时失去了。如何填补他留下的空白,重建新的秩序和平衡,成为一个横亘在小说里的巨大命题。在完成这个命题时,小说人物内心的隐秘世界向着读者敞开了。

重要角色在一开场就死去,并不是新鲜的写法。金庸的《雪山飞狐》、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等都通过回忆、场景再现等手段,重新“复活”了人物。但《糖婚:人间慢步》有别于这些小说的新鲜之处在于,于新不是被动离场,而是主动选择了离场。他被“复活”,但更被审视。

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于新身处风口,“毫无疑问是已经起飞的猪”,金钱、权力、欲望不断载他日渐膨胀的心。“大多数时候,他享受着这一切,可当他安静下来,又感到前所未有的羸弱无助”,在这种矛盾中,于新患上了抑郁症。因此,当女大学生万红问他“努力真的就能成功吗?”“人一定都得成功吗?”“当世俗的成功不是自己想要的成功时,世俗的认可又有什么意义”时,他那成功者表象下的真实内心便被击中了。

在这里,按照一般小说的路数,于新该来一场婚外恋了。但蒋离子突破了套路,小说通过于新司机的回忆,干脆利落地交代了万红和于新的两层新关系:其一,万红要于新娶她,于新却只把她当成“能一起说真话的人”;其二,万红已决心去死,不再需要于新时,于新才开始需要万红了。

“你不杀伯仁,伯仁却因你而死。”当万红留下遗书,自杀未遂成了一个植物人时,于新背上了愧疚。在愧疚里,于新借司机的名义来赎罪,承担了照料万红的费用。对于新来说,万红在,希望就在。

钟求是小说《地上的天空》里,提出了一个“撤退人士”的概念,认为性格里藏着“撤退”元素的人,可称为“撤退人士”。“譬如撤退人士是A,那么三个人散步,A十次有九次不会走在中间,而一堆人拍集体照,A十次有九次是站在旁边的。”这篇小说里,“配角男人”朱一围拿着“下一世婚姻协议”精神出轨,自己给自己做了一回主。

《糖婚:人间慢步》里的于新,“善良得有些过了头,只跟自己较劲,什么事都憋在心里,没有人可以说话”,他有一颗“配角男人”的心,却被事业推着成了一个“主角男人”。他有出轨的条件和机会,却连精神出轨都没有。他开的酒吧、送安灿的新婚礼物(一个看星星的营地),全不以盈利为目的,充满着冷眼观世相的冷冷清清。一句话,这位于新活脱脱是“撤退人士”的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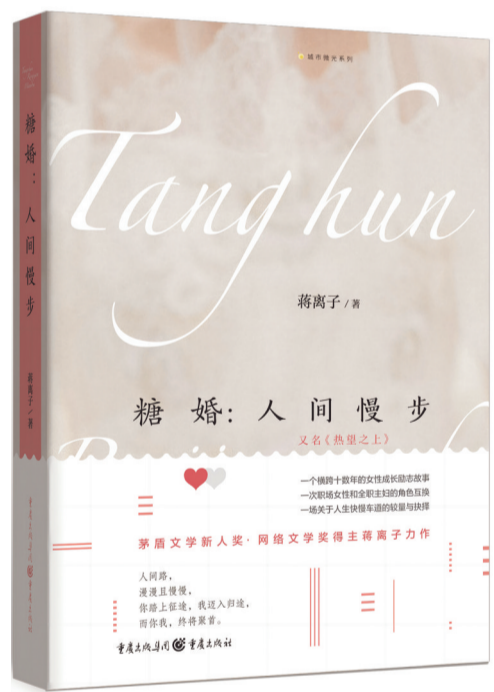
当内心想着撤退,而现实却推着它挺进时,他的心理便失衡了。于新也曾努力寻求过平衡。万红去世后,他做好人的希望、被需要的希望、可以自由倾诉的希望,也就不在了。失去精神支柱的他,平衡已彻底打破,撤退之时来临了。撤退之后,他还细致地做了安排:为了合作伙伴安灿,他重启了与韩企的合作计划;对妻子林一曼,他说着“家里有你,我很放心”;对驾驶员老刘和万红的姐姐万青,他也感慨地给了一笔钱。

一个在商界拼杀的人,终于一步步撤退到火场里。于新的撤退宛若回归大海,激起的巨浪正在冲击着他身边的

撤退与挺进：一种面相和表情

——蒋离子《糖婚：人间慢步》读后

□高上兴



人。首先是他最亲密的两个女人,人生角色开始发生戏剧性的互换。一个是合作伙伴安灿,这位“比起缅怀,更喜欢畅想未来”的强势女总裁,在失去于新后,并没有像于新生前所料想的那样,带着企业走向巅峰。相反,于新的离去使安灿的事业陷入了新的危机。

安灿和于新仿佛是磁铁的两极,安灿强势、激进,于新温和、保守,一极既失,另一极便失去了意义。没有于新的调和,安灿的激进显得不合时宜。在同事的背叛和反对里,安灿的事业看似步步稳赢,实则节节败退,最后以辞职而回归家庭。当安灿卸下公司总裁的职务,回到家庭时,她所熟悉的那套职场法则也失去了效力。甚至,丈夫刘瑞身边也出现了比她更年轻、更诱人的追求者。这些都让她不得不停下来,反思和审视自己。在长久的反思和审视里,安灿有了心灵的成长。

再说于新的妻子林一曼,这位没有什么事业心、甘于当一个富太太的女人,却被推上了公司总裁的位置。这虽然是安灿的“反对派”们制造的阴谋,但她既从家庭里被拖曳出来,推到繁杂的职场生活前台,就不得不从一个当摆设的“吉祥物”开始,跌跌撞撞地学会独当一面,开始总裁之路。

围绕着职场变动,和于新、安灿一起创业的薛燕也不得不撤退。薛燕的退场,有一种体面的狼狈。她是安灿的“反对派”,是林一曼人主新灿的主要策划者和推动者。但这个没什么文化的老派创始人怎么是安灿的对手呢?没两个回合,安灿便扒出了她的桃色隐私。好在,职场之外有真情,在不动声色间,安灿把薛燕远远“发配”到分公司,也算给这位老同事留下一点面子了。

于新死了,薛燕远走了,安灿辞职了,这三个公司的创始人至此完成了撤退。

前浪撤退,后浪奔涌。林一曼、陆玲玲、杨奇、何夕等职场新秀们,在于新撤退后留下的空白里,挺进了新的奋斗征程。然而,到底什么是“成功”?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成功学的鸡汤并不足以抚慰焦灼忙碌的心灵。在世俗的热望之上“慢步”人间,努力寻找身与心的平衡之道,才能让人更从容地撤退与挺进。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蒋离子写出了一种这个时代的面相和表情。